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 修订本 ·

梁 柱 著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图书在编目(CIP)数据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梁柱著. 修订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5

ISBN 7-301-00536-9

I. 蔡… II. 梁… III. ①蔡元培(1867~1940)—生平事迹
②北京大学—史料 IV. ①K825.4 ②G649.281.1

书 名: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著作责任者: 梁 柱 著

著 作 编 辑: 吴金泉、胡双宝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00536-9/C·37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275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752032

排 印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285千字

1996年5月第一版 1996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目 录

前 言	(1)
一 民主革命家、教育家	(1)
二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21)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21)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34)
三 锐意改革 整顿学校	(42)
领导体制	(42)
学科改革	(50)
创办研究所	(56)
开男女同校之先河	(69)
倡导平民教育	(76)
四 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	(89)
兼容并包方针	(89)
大量引进新派人物	(99)
不拘一格网罗众家	(116)
五 学制改革与课程建设	(123)
实行选科制	(123)
融合中西文化	(128)
注重学理研究	(139)
以美育代宗教	(148)
首创学生军	(158)

六	开创学术研究、思想自由的风气	(163)
	提倡研究 启迪新知	(163)
	扶植社团 百家争鸣	(178)
	倡导道德文章并重	(196)
七	在新旧思潮的激战中	(206)
	“白话派一定占优胜”	(206)
	“劳工神圣”	(219)
	林蔡之争	(227)
八	在五四运动中	(240)
	支持学生爱国运动	(240)
	辞职离京与“挽蔡”斗争	(250)
	胜利返京复职	(261)
九	反对军阀政府摧残教育	(267)
	“教育独立议”	(267)
	讲义费风潮	(277)
	不合作主义	(281)
十	一次失败的试验	(294)
十一	结束语	(304)
	蔡元培生平大事年表	(314)

前 言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中,蔡元培是颇具特色的。他以一个曾得意仕途的清季翰林,却转变成为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反清斗争中曾提出以暗杀和暴动为手段的激烈主张,而却是一位以宽容和恬淡自处而著称的长者;他旧学深沉,深刻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有明确的开放意识,取文化世界主义的主张;在旧中国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他却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为祖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一生虽然有过曲折和失误,但始终追求真理,憎恶暴虐,为民族的解放和进步呕心沥血;他虽然身居要职,却自始至终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道德文章垂范人间。毛泽东曾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则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历史功绩:“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确是正确地反映了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一生。对蔡元培这样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过重要贡献、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给予正确而恰当的评价,深入研究他的思想和事业,这对于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以借鉴于现在,是很有意义的。

蔡元培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在文化教育上尤为巨大。他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民主教育家,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杰出的先驱者。他委身教育事业后,即明确要为革新政治而培养人才。民国建立后,他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虽然时间很短,但开始了施展他的改革中国教

育的抱负，在他的倡议和努力下，初步建立了我国新式的、与共和政治相适应的教育体制。当然，蔡元培在教育事业上最杰出的贡献，是对北京大学的革新。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积极倡导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发展的办学方针，热心引进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样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执教，使各种人才荟萃于沙滩“红楼”；大力扶植各种学术政治社团，培养了学术研究、思想争辩之风，使新思潮新思想在这里应运而生；实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对学校领导体制、学制与课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北大成为人才辈出的最高学府。经过整顿和革新，把一个陈腐不堪的“封建文化营垒”，改造成为生机勃勃的新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蔡元培对北大的革新，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一个学校的范围，而影响到整个文化思想界。这是蔡元培一生事业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从此以后，他的名字就和北京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居北大校长名义虽十年有半，实际在校视事仅五年余，在这样短的时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产生如此广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至今仍为人们所怀念，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罕见的。而他在丰富的教育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大学教育思想，也确有许多创见和卓识，一些精到的见解，确是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因此，我在写作这本书时，冀望能够通过它再现当年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生动情景，能够缕刻丝析其中所体现的大学教育思想，以使我们从中得到启迪，获得教益；同时也借以表达对这位一代宗师的景仰之情。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

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对整个历史应取的态度说的。如果就教育方面而言，我们不也应该对从孔夫子到蔡元培来一番总结吗？诚然，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教育，应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千百年教育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就不能不反映出某些共同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说，教育也同其他领域一样，不应当割断历史，要承认历史的继承性。我们在建国初期，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我们的教育体制，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帮了忙的，但后来的事实说明苏联模式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实际。1956年，党和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路的任务。不幸的是，在这关系到我国继续前进的重要时刻，党内“左”的思潮急速增长，致使从探索新路这一正确的命题出发，却导向了错误的结果。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学校更是和“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1958年开展的“教育大革命”，批判了所谓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术观点，不加分析地否定了历史遗产，否定了老教师、老教授的作用。此后，频频“折腾”。“文化大革命”到来后，连大学要不要办竟也成了问题，遑论其他？二十多年来，我都在教育领域体验了一次又一次的“震荡”，经历了从新奇到迷惘到失望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从反面使我深深体会到，造成这种局面虽然有许多因素，而蔑视历史，否认历史（包括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历史）的继承性，以为靠批判一切便能创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无产阶级教育的新制度来，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否定一切，最后否定了自己，被传为笑谈的所谓“和十七年对着干”，便是一个否定自己的典型的口号。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些经历和体会，也使我对蔡元培，对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望能够通过深入研究,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这大概就是古人所云:“明镜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的道理吧。自然,我也希望这本还很粗浅的著作,能引起更多的教育工作者研究教育史,研究教育发展规律的兴趣,借以充实自己,真正成为办学的里手、内行,如果这样,就足以补偿我为此付出的一点辛劳了。

诚然,对待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和事业,重要的是要取历史分析的态度。简单的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是最便当不过了,而这恰恰是幼稚的、不成熟的表现;因为这样做,有可能违背历史实际,因而是科学的。对待蔡元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同样也要取历史分析的态度。拿他在北大革新时提出的著名的“兼容并包”办学思想来说,这在当时确是一个具有指导作用的办学方针,同时也是他的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一方针在扶植新文化新思想方面所起的进步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就发展新教育和繁荣学术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来说,它又确是适应了发展文化教育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人才培养和学术进步,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文化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的。我们对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不仅要肯定它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而且还要研究在它特定的内涵中所蕴含的对发展文化教育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这一方面,对我们则更具有借鉴的作用,反映了思想的继承性。

具体地举例说,诸如:第一,这一办学思想反映了对学术与政治关系上的正确处理。这是发展学术常常遇到的问题。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又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蔡元培并不否认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且是坚持学术与教育活动必须为民主共和政治,为振兴国家服务,这是发展学术和教育的大前提。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他又把学术和政治作了严格区

分,主要表现为:一是不以人废言;二是反对用政治干涉学术,反对封建文化专制思想,允许学术研究的自由。这种对学术与政治二者关系的正确处理,既体现了蔡元培办学思想的反封建性,又反映了发展学术的客观要求。陈独秀在阐述蔡元培兼收并蓄的宗旨时曾说:“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申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些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① 这里所说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也首先包含蔡元培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正确处理。陈独秀对他办学宗旨的解释是正确的。第二,这一办学思想所体现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原则,反映了发展学术、教育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就学术研究而言,它实际上是探求真理的一个过程,而真理是具有相对性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今天被认为正确的事物,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或认识的深化而成为谬误,反之亦然。因而学术研究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用一种简单的、绝对的标准加以限制和判断。蔡元培曾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② 应该允许他们并存,自由讨论。他认为,我国先秦时代思想界所以出现百家争鸣这种“空

① 引自《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②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

前绝后之伟观”，是因为“种种学说并兴”、“相竞相攻”使然的，到汉武帝采董仲舒独尊儒家之主张，遂使“诸家之说燔矣”。^①他极力反对这种“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反对封建性政治和文化专制对学术思想的束缚。这些认识应该说是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他的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的原则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第三，这种办学思想体现了发展学术、教育所必不可少的民主领导作风。这方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不再赘述。上举数端，说明蔡元培办学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面，在今天仍具有现实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当我们根据历史的实际，充分肯定这一办学思想的进步作用和现实意义的时候，也并不是把它看作是完美无缺的。应该看到“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作为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不能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蔡元培曾用《礼记·中庸》篇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来解释他的“兼容并包”主张。但他对这里所说的“道”，并没有作出性质和内容上的明确限定，人们可以进行随心所欲的理解；其“容”与“包”的对象，既可以是新的进步的思想、学说，也可以是旧的、落后的理论、流派。他自己曾认为哲学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可以并行无害，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如果对这一办学思想作外在性的理解，那么就会是不分主次地把新与旧相互对立的東西包容在一起，这就否认了对立物的质的区别，看不到发展过程中的飞跃和突变，抹煞了对立物的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也就抹煞了人们在新旧事物斗争中催新破旧的历史责任。由此可见，“兼容并包”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概括，表

①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9页。

现了蔡元培思想上存在的折衷、调和的倾向,反映了在反封建文化斗争中的不彻底性。这种概括的外在性,既不能科学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教育实践。事实上,蔡元培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对世界大势的深切理解,使他在对北大的整顿中始终坚持革新进步的方向,而不是让新与旧、革新与保守无原则的混合并存。“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所以能够孕育出一个新的北大,正是他扶植新思想、约束旧事物和反对封建旧文化的结果。所以,具体就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或扩而大之就一般的历史遗产的继承来说,重要的是要挖掘它内在的深层次的思想内涵,而不是要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重复旧的口号。

总之,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成果,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遗产,是值得我们珍视、研究和借鉴的。历史总是在前进,研究前人,是为了超过前人。特别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这是蔡元培生活的那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蔡元培生前最后一次表达对北京大学的祝愿,是在1938年北京大学诞生四十周年的时候,那时中华大地战火弥漫,寇深国危,北大被迫南迁,但他仍充满信心地说:“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①虽然今日已时过境迁,但老校长这一祝愿的深情,特别是深信未来的北大定会有特殊的进步,这对于即将迎来建校百年庆典的北京大学来说,仍是一个寓意深远的激励。

这本书,1983年曾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宁夏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增添修订,并经宁夏人民出版社同意,增订本改请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① 《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236页。

本书初版时承蒙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先生生前热情题笺。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一些友好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谨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

限于水平，增订本仍不免会有舛误和疏漏，恳切欢迎读者和同道惠予指正。

作 者

1995 年 1 月于燕园

一 民主革命家、教育家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杰出的教育家。他的一生,始终追求光明,憎恶黑暗,坚持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民族民主主义的立场,为我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重视教育,为改革中国的教育制度,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业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先驱。

1868年1月11日(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景物秀丽、人文荟萃的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他原字鹤卿,后自己改字仲申,别号鹤庐。至创办爱国学社时,则常以民友为号。1904年主编《警钟》日报后,尝谓:“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因取《诗经·大雅》:“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两句中各一个字,易号孑民,从此孑民成为他的通用字号。

蔡元培生长在一个中产的商人家庭里。家中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二。其父蔡宝煜(又名光普)曾任钱庄经理,为人和善宽厚,乐于周济他人。蔡元培从小尊敬长辈,事亲至孝。在他十一岁那年,父亲病逝,家道中落,靠他母亲勤俭持家抚养他们兄弟。母亲周氏是一位贤惠的女性,她平时常常勉励他们兄弟要“自立”、“不依赖”和“不妄言”,要他们谨慎处世。后来他曾自述其母常言:“每有事与人谈话,先预想彼将作何语,我宜以何语应之。既毕,又追省彼作何语,我曾作何语,有误否,以是鲜愆事。”蔡元培从小受这种母爱的教育,并且生活在这样一个已经衰落了

商人家庭里，这对于形成他的进取而又宽厚的性格，是有影响的。

蔡元培自幼刻苦好学，因家贫节省灯火，就常常借灶火的映光夜读。先是得到叔父蔡铭恩的悉心指导，后在本县老秀才王子庄处受业，从而使他没有承继祖业经商，而走上了治学的道路。他少年读经，学作八股文。和同时代人一样，他在青少年时期也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曾一度崇拜宋明儒家，言动拘谨。他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要恪守古训，例如母亲生病，曾刲臂和药以进；母亲病故，不顾家人劝阻，坚持要行“寝苫枕块”古制，这在当时习俗中也算是近于迂腐了。1883年，他考中了秀才。蔡元培以他的天赋、才能和功力，使他具备了跻身宦海的条件。但是，他在青年时期就无意于功名禄利。他毕竟生逢国家多事之秋，这时绍兴的生活虽如一潭死水，但外侮纷至，国势日衰的险恶情势，同样在这里激起了点点浪花，震撼着这位有为青年的心。他希望于学问中寻求一条新的出路。他考取秀才后，就不治举子业，开始自由阅读。这时他为绍兴一位藏书家校订图书，得到博览群书的机会。他读书重思考，不盲从，并且注意从书中吸取民主的精华。如他读清末学者俞正燮^①的《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时，不仅对俞的历史考据方法甚为称赞，而且对他著作中“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更是推崇备至。1910年他在德国留学时所著《中国伦理学史》一书，曾以显著篇幅介绍黄宗羲，戴震和俞正燮三家学说，鼓吹民权和女权。由此可见俞正燮的著作对他影响之大。蔡元培在青年时代就大力肯定和赞美俞正燮的尊重女权思想，说明在这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已经开始萌芽。这时他喜爱的

^① 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道光举人。学问渊博，晚年主讲江宁惜阴书院。曾纂修《黟县志》、《两湖通志》等。

有关考据和词章等的书籍,除上述俞著外,还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他后来曾回忆说:“我青年时代所喜读的书,虽不止这三部,但是这三部是我深受影响的。”^①他偶尔也在书院里作八股文,但已不再严守老八股的格调,而喜用古书通假的字调换常字,并用古书中奇特的句法变换常格。这种别出心裁,不同凡俗的怪八股,常使那些老八股家几乎读不懂。这说明蔡元培这时已开始看到八股文体对思想束缚的害处,不愿附庸清雅,靠做那种无用的制艺,作为攀登宦门的阶梯。蔡元培对科举制度的蔑视,孕育了他后来反对封建文化教育的民主思想。

蔡元培在科第仕途上是弄潮骄子。他应试时仍是做那种不合时宜的怪八股,但因文章奇古博雅得到了主考官的赏识。1889年乡试中举人,1890年赴京会试告捷,1892年补殿试取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职翰林院编修。这时,他作为一位才华出众的科举道路上的幸运者,受到了时人的赞赏,当时户部尚书翁同龢在蔡元培拜见后曾在日记中写道:“新庶常来见者十余人,内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②

正当蔡元培踏上宦门坦途之时,却是国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清王朝处于日暮途穷之日。虽然蔡元培在这时还不可能了解事变的全部和中国积弱的病根,但他毕竟是处在清王朝统治中心的北京,比过去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局势的发展。他敏锐地感到了国家危机的紧迫,觉察到当时知识界中要求变革的新思想的潜流。从这时起,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维新派的论著,披览报章时事,并且开始接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1894年,即蔡元培出任

①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页。

②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八年五月十七日。

翰林院编修这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蔡元培的思想以巨大的震动，他痛感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他写道：“上决与倭议和，和约十事，其大者，割台湾，割奉天辽阳以东，遵海而南至旅，给兵费二万万，定七年毕给。倭人驻兵威海，岁给兵费五十万。俟二巨万毕给，乃退兵，皆允之矣。日蹙百里，且伏祸机。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愤怒谴责清廷“疆臣跋扈，政府闕茸（卑贱的意思），外内狼狈，虚疑恫惕，以成煬灶（放在炉火上烤的意思）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认为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①1897年，他指摘清廷签订的《中俄密约》，是误国的对外政策，指出：“吾中国近二十年仿范雎远交之策，甚睦于德，近又推诚于俄。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②这时他对清政府的误国卖国行径有了较深入的认识。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以救亡图存，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为目的的变法维新运动。蔡元培对这场运动是深表同情的。他这时已受到维新派的影响，倾向改良主义的主张，对维新派人物，尤其是表现“冲决一切网罗”勇气的谭嗣同十分钦佩。在这期间，他曾较广泛地涉猎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译著，并对自然科学书籍发生兴趣。他潜心研究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和设施，从中加以比较，以寻求救国之道。从他对一些著述读后所写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这时他在政治思想上的变化，以及对当时维新潮流的态度。例如，他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后写道：“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弊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③后对宋育仁（清廷驻英参赞）介绍

①② 蔡元培《杂记》手稿，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7、9页。

③ 《杂记》手稿，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8页。

英国国情的《采风记》、《时务论》等书又评论道：“其宗旨，以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遂欲以古制补其未备，以附于一变主道之谊，真通人之论。”^①这无异是赞同维新派倡导的“托古改制”思想。蔡元培为了能直接博览外文书籍，还在京请人教授日语，不久就练习试译《万国地志》序、《日人败明师于平壤》等文，竟“有文从字顺之乐”。^②其后又译过日文的《日清战史》、《生理学》等书，并开始学英语。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时他学习西方“新学”的浓厚兴趣和热烈程度，然而，蔡元培并没有和康、梁们一起行动。这固然是由于他仍然没有摆脱士大夫的习气，认为他们正在炙手可热之时，虽与梁启超有己丑乡试同年的关系，也不往纳交，以避依附之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认为欲图变革，必须首先从办教育入手，对维新派“欲恃孱弱君主，藉政令以行改革”的做法并不完全赞同。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蔡元培的教训十分深刻，他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固，不能不情见势绌。”^③这个认识，对他尔后一生的事业，即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都无作官意，唯有读书声”。这是蔡元培写在京师寓所书斋中的一帧条幅，也是他数载翰林生活的真实写照。戊戌政变后，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已“无可希望”。因此，他断然决定托疾请假，决绝仕途，离京南下从事教育。

蔡元培抛弃了为当时世俗所称羨的功名前程，卸却了一个沉重的因袭重担。这是他朝封建叛逆者道路迈出的决定性一步。1898年冬，他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开始了他从事新式教育的活动。这个学堂依学生程度的不同分为三斋，大致相

①② 《杂记》手稿，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9、10页。

③ 蔡元培口述、黄世晖笔录《传略》，《蔡子民先生言行录》（上），新潮社。